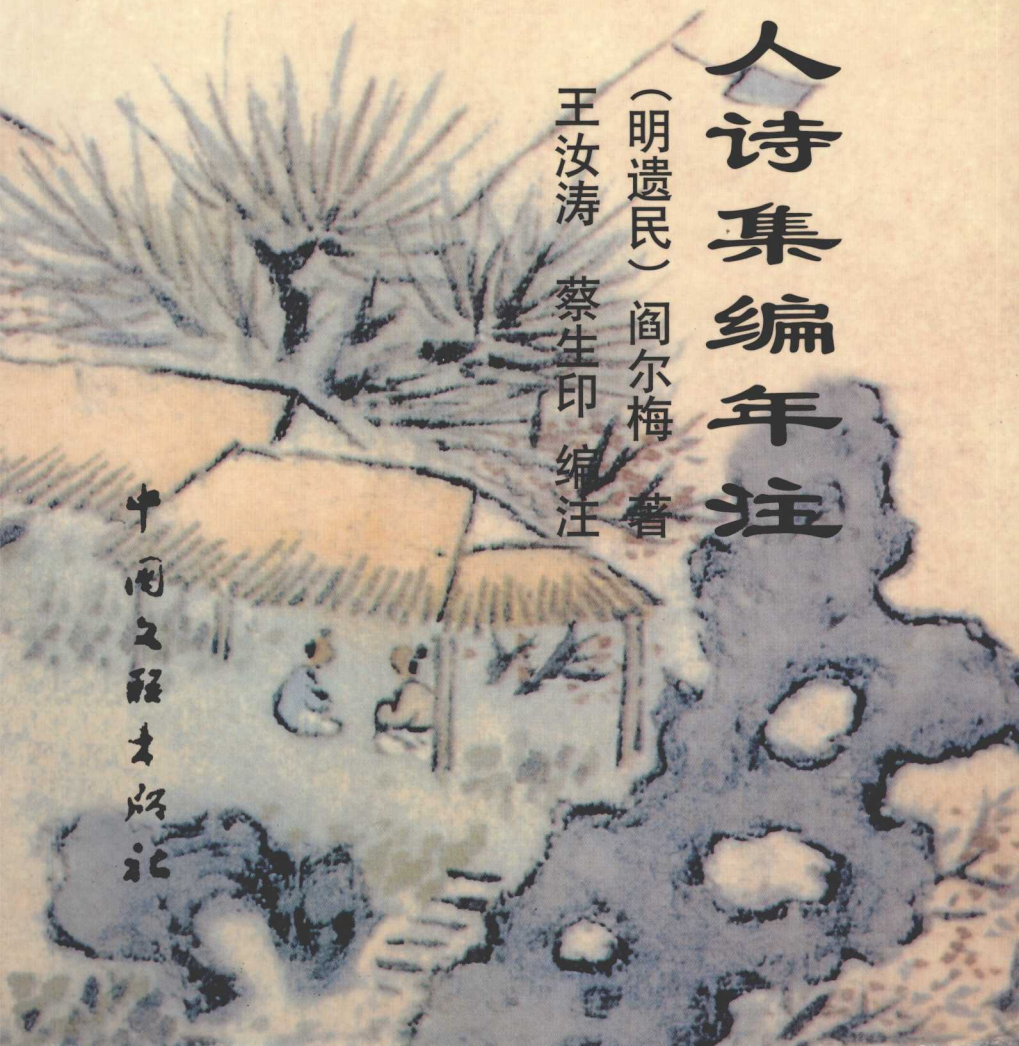


白耆山人诗集编年注

(明遗民) 阎尔梅 著

王汝涛 蔡生印 编注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白耆山人诗集编年注

(明遗民) 阎尔梅 著

王汝涛 蔡生印 编注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奎山人诗集编年注/阎尔梅著,王汝涛 蔡生印编注.-北京:
中国文联出版社(文化与学术丛书/徐传武主编)

2002 ISBN 7-5059-4033-3

I. 白… II. 阎/王/蔡… III. 古籍-整理-研究 IV. 1252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1238 号

书 名	白奎山人诗集编年注
作 者	阎尔梅
编 注 者	王汝涛 蔡生印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王 军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760 千字
印 张	29.2
印 数	0001-1000 册
插 页	2 页
版 次	2002 年 6 月第一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4033-3/I·2612
定 价	46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

前 言

白奎山人，江苏（明代属南直隶）沛县人。本名阎尔梅，字用卿，号古古。降生时耳大，白过于面，故于清顺治 16 年逃避清廷官吏缉捕时自号白奎山人。他是明末清初有名的诗人，又于明亡后参与山东榆园起义军，失败后逃亡各地，反清之志至死不变。与遗民顾炎武、傅青主等志同道合、友谊深厚。又与万年少并称为“徐州二遗民”。其人其诗，当时声望均高。今日视之，仍然足以传世。

山人生于明万历 31 年（1603），他父亲是有学问的老塾师，当时在山东兰陵褚家坐馆。山人年 7 岁，附馆由父亲教读。12 岁，随父亲回故乡沛县。16 岁入县学。21 岁游学江南，大约此时加入复社。28 岁在北京参加乡试，中第 24 名举人。循例，次年春应参加会试，及第者为进士，依名次授官。但是，试前因品评人物，得罪了尚有势力的阉党（曾依附宦官魏忠贤的朝官），不被允许参加会试。以后至明亡，山人始终以举人的身份居乡，未曾为官，但是，为家乡作了些有益的事。

明亡，清帝福临入北京，派兵南下。明臣拥立福王于南京，是为弘光帝。诏命史可法以大学士督江北兵马，进驻白洋河。史聘请山人入幕府。山人献策请史公镇抚并使用高杰余部，北据徐州，迎战清兵。史不能用。山人走淮安，依刘泽清。清兵破南京，擒弘光。山人劝刘泽清进兵抗清，刘不听，以小舟放逐山人。山人辗转返乡，居家二年，前后二任沛令及清大吏、山人之

友陈名夏（百史）都劝山人出仕于清，被山人拒绝。清顺治4年，山东范县附近有榆园军起兵反清。山人参加了义军，为之奔走于山东、河南间，联络遗民以期壮大声势。顺治8年，清廷以马光辉为直隶河南山东总督，移驻大名，督剿榆园军，榆园军败，首领收监，词连山人。次年8月，山人在家乡被捕，被八县兵押送大名。马光辉令送济南下狱。顺治10年，移宽侯所，得以自由出游济南名胜。11年8月，山人趁机潜返故乡，平毁祖坟，为潜逃计。山人之移宽侯所，《年谱》及《家传》皆不言其故，但与其友人陈名夏为清廷大学士不无关系。此年陈名夏获罪赐死。次年，山东司李即会同徐州金事派兵至沛县缉拿。山人妻妾自缢死。山人携次子熨得友人助，逃往河南虞城，转匿于通许。

自顺治13年至15年，山人自称吕老或翁先生，逃亡于河南、山西、陕西三省间，而以在河南往来于通许、许昌、鄢陵、临颍、密县、禹州、登封、洛阳的时间为最长。当时改名白牵山人，以善诗，多交各地名士，并结识不少地方官，有时居住在他们园林别墅中，少有人知其为閩古古者。15年岁暮，事稍缓返乡，葬妻妾张氏、樊氏，寄托二子，遂又出游。16年渡黄河而北，由济源入山西，经猗氏、芮城、入陕西。这是山人第二次入陕，行程最远，北游至榆林，又从宁夏入兰州至枹罕。回陕西后，越秦岭，至汉中。此次远游，避祸之外，意在游历，并藉以结交各地遗民，如游华阴即寓王宏撰（山史）家。这与顾亭林的出游结交各地豪杰用意相同，他们均不欲遵奉清之正朔，欲寻找机会以恢复故明。

在汉中住到岁暮，越大巴山至四川保宁（今阆中市）。作为改任四川布政使的杨犹龙座上客，顺治17年，山人遍游附近名胜，更远游至成都及青城峨眉二名山。然后由保宁回汉中，沿汉水东下，经襄樊至武昌，在附近稍事游赏，去巴河吊其中举时的

座师明东阁大学士姚明恭，又沿江东下，至九江，在庐山居住至顺治18年，乘间去南昌一游。此年正月，清帝福临薨，子玄烨即位（明年改元康熙）。秋季山人在庐山得知故乡人士为之申诉，罪名得以平反。便东下至苏州。康熙元年，游昆山、云间、太仓。又渡江至扬州、淮安。在江南、江北期间，会见名士钱牧斋、杜于皇、孙豹人，故交阎再彭、胡天放、陶震、吴嵩三等。十二月，返沛县。居家不久，又为仇家所告（罪名《年谱》及《家传》均未详记，似以诗贾祸），再次出亡。自康熙2年至4年秋，经山东北上，至昌平拜崇祯陵，出宣府，游北岳恒山，至山西大同，雁门关。其旧友龚孝升时为清刑部尚书，为之疏通，得宽免。12月山人入都，与孝升及汉人诸名士饮宴唱游。当时山人的诗，已在京师被人传诵，但是，仍然不愿承认清朝正朔。只是，南明永历帝已被吴三桂杀害，台湾郑成功已死。反清复明，没有希望了，山人只好退而从事“立言”。想为后世留下点有意义的著作。他除了写有关古史正统的《帝统乐章》以外，又打算对北方军事要害作系统的考查，写成一部《边史》。故5年还沛，为次子完婚后，6年复出游。

这次出游，曾东出榆关，南下游太行山，越太行入山西，北游偏头、宁武、雁门三关，沿内长城至蔚州、广昌。至11年冬返家，时年已70岁。康熙12年，吴三桂等三藩之乱起，山人本有南游闽粤之志，以清兵与吴三桂耿精忠相持于川湘赣浙之间，打消此意，从此安居家乡，不复外出。删削出版了诗集，而《边史》却未写成。康熙18年（1679）十一月卒，享年77岁。

二

山人祖及父虽然以老塾师终其身，而姚明恭为其父恩讷撰墓誌铭，称其家“世治毛诗”。山人一生未出仕，历两朝五帝，邀

游南北，所至多交名士，人皆敬之，成名大部分由于其所作诗早已传之遐迩。邓之诚《骨董琐记》引戴枫仲《游崇善寺记》，称“閻古古……庚午举于乡，能诗，有名崇祯间。”可见其以诗得名之早。鲁一同撰山人《年谱》中所附的《寅宾录》，记与山人有文字交的人诗文书札，其内容多赞誉山人之诗，或与之唱和，可以为证。较全面评价山人诗的，为邓之诚《清诗纪事》，节引其文于后：

尔梅有《白奎山人诗集》10卷，《文集》2卷。刻于康熙14年乙卯，多所芟削，出于手定。诗才若海，茫无涯涘。说者谓似太白，盖论其古体。若律绝不薄七子，而格律谨严，声调沈雄，纯以史事隶之，与靡靡者异，当时无不重之。吕留良睥睨一世，闻人誉之半似閻古古而喜。计东数康熙初京师耆旧，依年为次，举孙承泽及尔梅、炎武三人。独为王士禛所轻。有戴栻者，祁县富商，喜藏书画古器，谨事傅山，尝匿炎武藏金。亦丑诋尔梅，以附于士禛，是所谓螭蛄不知春秋者也。

萧一山《清代通史》，在《清初之文学》章中《诗歌》部分，介绍山人之为人及其诗：

乃亡命豫秦楚蜀间，遍游名山大川，诗有“一驴亡命三千里，四海无家二十年”之句，盖纪实也……入京……鼎革（龚孝升）偕众客宴之慈仁寺，尔梅自称曰：“国亡，破万金之资，为国家报仇，天下震动。事虽不成，卒不为所杀。乱世不失足，疾风劲草，此布衣之雄，于某足矣”……尔梅为诗，不尚虚靡，又以“圣人以史尊王，学者以诗代史”之意，因作《帝统乐章》，则亦牧斋、梅村之流亚也。况钱、吴、龚均以贰臣为人疵，而尔梅尤有足称者。

山人的诗，在当时，虽无“大家”之名，称为“大家”却当之无愧。

清初，诗人被称为大家的，为钱、吴、龚、其次为宋琬、施闰章、王士禛，已属第二流，朱竹垞（彝尊）诗名为词名所掩，也可以比肩王士禛。而顾炎武、王夫之、黄宗羲、屈大均以及山人，却不被视为大家。至现代，治文学史者，卑薄钱、吴、龚等贰臣，转而表彰顾、王、黄等遗民。山人则未被赋予应有的地位。其原因有二：

一、旧时代论诗，多重词采、格律、或重难以捉摸的“神韵”、“境界”。总之，着眼于文字技巧者为多。然而钱牧斋于明代所作诗，力矫前后七子拟古之风及三袁、钟、谭诗歌脱离现实之弊，称扬白居易、苏轼、陆游的诗风，实开清诗复振之先河。他自己所作的诗又足以实践其主张。入清以后，他诗中反映了清兵残破江南的现状和歌颂郑成功进军长江之捷。《有学集》中的《西湖杂感》20首、《病榻消寒杂咏》46首，《投笔集》中的《秋兴诗》百余首，情挚言切，流畅中见出对诗的语言运用之妙。吴梅村诗专模唐人格调，古诗如《永和宫词》、《圆圆曲》、《清凉山赞佛诗》等包孕当时秘史，而又文词优美，或谓不减元稹与白居易。入清之后，近体诗亦多曲折地隐括当时清廷鲜为人知的史事，故后人每以“诗史”称之。虽然文词过分追求靡丽，是其缺点，而只从“论文”的角度看，他与钱牧斋还当得起“大家”的称号。至龚孝升，其诗中谏饮酬酢之作多于凭吊登临，风格不及钱、吴远甚，实不足称为大家。据顺、康之际的诸多记载，山人的诗名不但为遗民顾亭林、王宏撰（山史）、李因笃（天生）、傅青主所肯定，从而与之订交，即钱牧斋，虽为东林前辈，而对复社后生的山人却甚为钦佩。《寅宾录》载其逝世前二年致山人的二通短札，可以为证。因此，倘若以山人配钱吴为清初诗人三大家，应是公允之论。可惜的是，山人生前曾因诗获罪，又鉴于顺康间已有镇压士人的苗头，启祚诗祸、哭庙案、江南奏销案，顺天闹狱和江南闹狱接踵而来，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反清诗文可能

再次为自己和家族带来灾难，故康熙 13 年手订诗集，大加删削，自咏云：“贾祸诗文尽数删。”阎千里《家传》记此事曰：“生平著书，多所散佚，行于世者，诗数帙而已。”考山人诗中精华，为人清不忘故明，时时见于咏叹这一部分。既已删去，后人读其诗集，只见到游历、闲适、赠遗、唱和部分，以为不能如顾、黄、钱、吴的“以诗证史”，即使钦服其才气文采者，也只能以第二流诗人视之。

二、更重要的一点是，山人的诗集，于山人死后又遭删削，主其事者为吴兔床，传本为豹韦堂本，即使此本，在雍、乾两朝大兴文字狱之后，亦遽尔散佚，只有残章断句，偶被某些诗话拈出。世不复知有山人其人，又安能评价其诗？

崔删诗事，见张相文《年谱》引崔兔床致山人次子阎哭（秩东）的书信中：“尊先生曾云：‘贾祸诗文尽数删’，胡乃言之不酬（说了没有做到）哉？此则后死者（兔床自称）之责也……义何能辞。秋以为期，侯郑兄再至城戒装（收拾行李到你家）矣。”相文有按语：“合观兔床之帖、通甫（鲁一同）之注，知山人卒后未久，以避祸故，秩东亟以删削诿崔，崔亦亟引为己责，则当时压迫情形可见也。自是以后，惟崔所删削者得行于世，通甫所见之存本是也，而山人所手订之原集遂以永阙。即千里为《家传》时，已弗克见。迨雍乾之世，往往以文字牵连，至于殒身赤族，虽世所藏匿之家，亦愈不敢出矣。”所谓通甫所见之存本，似即为阎氏家中世传之本，故鲁一同得以见到。鲁谈到此本特点，仅说“山人原集中，忌讳之语尚多，今存本无有也。即某所见，亦有此集所不载者。”终清一代，传世的大约只有这一个版本。

清帝退位，清祚已新的第二年即 1913 年，张相文先生在北京结识了山人的裔孙阎汉亨，详细了解了山人的为人，“益思古先先生高节不置”，又知山人的诗集散佚不全，有志于觅求更全

的版本以表彰这位于明清易代之后反清的遗民。多次在北京厂肆中访求。民国七年（1928），偶然在小市露摊中得到一种卷数较多的版本，取鲁一同著《阎古老年谱》核对，觉得不相合之处很多，便致函阎汉亭表示欲重编山人的诗文集。汉亭以家藏的山人文集二卷、诗集上下卷，写本诗集三卷和阎千里撰写的《家传》邮往北京。相文先生经过比勘研究，认为阎氏家藏诗集，只相当于全诗十分之二、三，写本仅存古诗首卷及五、七律的两卷，实为残缺不全之本。而从书摊访购的才是山人手订集的原刻本。于是与孟森、吴涑商订体例，汇编为诗集十卷、文集二卷，印刷问世。这是山人泯没二百余年真正公开流传的第一次。但是因为印数不多，又时值军阀混战，不久抗日战争开始，干戈扰攘之际，即使得以披览阅读者，也少有人为之评价传扬。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连张相文重编的集子也很难找到。这是山人的诗未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得到应有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。

正是有鉴于此，我们才将张相文先生使之传世的《白耒山人诗集》10卷本，予以编年加注，使之能够更易为读者接受，使一代诗人不致因特定原因永被埋没。庶几作为我们对古籍整理工作做出的一点微薄贡献。

三

山人的诗，前引邓之诚先生的评语，盛赞其古体。其实，山人自祖父以来，既以毛诗为传家之学，作诗自然上溯先秦，下仿汉魏，然后取法唐宋，为古近体诗，堪称佳作者，并不限于某种体裁。下面分别介绍山人各体诗作。

其取法先秦的有《古逸诗》11篇，自《皇娥歌》至《易水歌》又续入《垓下歌》、《八公操》、《大风歌》、《秋风辞》及《落叶哀蝉曲》。这是一组模仿古代歌谣，用其名易以新辞的作品。

先生自谓“藉题寄赏，不徒仿其体拟其辞也。”这16首古逸诗，因为内容多受原作限制，虽然偶见新意或寄托，如《击壤歌》中，“壤之为技，与剑术通”，《采薇歌》中“爰书大义兮铭之山阿，俾我后人兮观感不磨”，但总的看起来，好像是“练笔”之作。虽然中规中矩，却并不出色。与之类似的是《拟汉安世房中歌》3首及拟古乐府39题。山人以为《安世房中歌》虽是汉宫楚声，实为乐府之始，故先拟作之，其后便拟作汉乐府、南朝乐府中的主要篇章。山人写作这一组诗，虽然也有练笔之意，但已颇有自己的见解。他以为古乐府的辞都可以看成诗，其声又是乐。辞出于田野男女游客戍士之口，近于俗。配上乐，就使俗者也变雅了。山人的拟作乐府诗，自然无法配乐，因此他便致力于文字的雅而易懂，却又不模拟白居易的“新乐府”，而想创出自己的风格。平心而论，这是一个不易达到的目标。山人实在志有所未逮。不过也有些诗篇颇有新意而又雅俗共赏，例如《乌夜啼》：“乌夜啼，啼不止，从来乌啼不如此。星黑窗未明，心惊披衣起。郎归倘在今夜里？”短短六句，一个等待夫婿（征人？）女人的形象通过内心独白便跃然于纸上。

山人又仿乐府中的《郊庙歌词》，制《帝统乐章》18章，歌颂山人心目中足以代表正统的中华历代帝王。除了代序的一篇外，歌颂了自盘古、三皇至明太祖的16位帝王。其中没有魏文帝、晋武帝、南北朝诸帝、隋高祖、五代的开国皇帝、宋太祖和元世祖。山人解释为：“曹丕继汉而司马炎、刘裕、萧道成、萧衍、陈霸先、杨坚……诸家，篡弑偏安，兼而有之，只可谓之僭逆。”“赵匡胤受周氏之托而竟篡其孤。偏安大梁，未能混一，可得上承帝统乎？胡元戎狄，又不足复道矣，故尽削之。”显然，山人在这里继承了《春秋》“大一统”和“夷夏之辨”的主张，但更重要的当是鼓吹清朝虽入主中国，却并非正统。萧一山《清代通史》于《排满之思想与运动》一章，特笔论之：“船山《读

通鉴论》，古古《帝统乐章》排扩猗夏，言尤痛切……古古诗云：‘扫除胡种落，光复汉威仪’。又云：‘祸自中原召，功为外寇成，久之天意厌，蹶厥圣人生。瓦刺三犁后，王藩改帝京。’……皆可以为当时人心之代表已。”说明了山人这一组诗歌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可忽视。

山人还有一组模仿《诗经》而写的四言诗，即自《明发》至《瞻白云》等8题。与《诗经》相比，只作到了形似。但其中《原乱诗》八章探讨明王朝衰亡的原因，颇有见解，抵得上贾谊的《过秦论》。

这三组仿古诗篇的写作，对于山人，除了练笔而外，还有一个作用，即山人有系统地诵读了大量上古中古优秀的诗歌作品，通过仿作的实践，为嗣后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山人诗作的主要部分，是他的古近体诗。这些经过被迫删改而有幸存留下来的约2000首诗，不但为山人坎坷的一生留下了清晰的足迹，还可以从多方面反映明末清初“天崩地解”的那个时代。前者可以有助于理解山人的民族气节；后者或含有为史书所无的资料，足以证史，更为可贵。山人的诗既然与当年史事密切相关，赏析山人的诗，就应当注意密切贴合时代这个因素。这里指的是，其诗的艺术水平固然随着年龄日长而提高，诗中表现的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与爱国主义，也随着时事的沧桑变迁而有不同的体现。

山人16岁入县学，开始写诗。不过青年时代的作品留下来的不多，只有《读书歌风台偶吟》，集中的《读书》，当是残存的一首，开头的四句写道：“穷经尝恨古人欺，不极群书不敢疑。班马异同犹是史，齐梁金粉遂无诗。”敢于疑古，显得出手就不平凡。21岁时，游学江南，与复社诸名士游。当时东林复社中一些有名诗人如钱牧斋、陈子龙、夏完淳、顾炎武等，已经摆脱了公安、竟陵体的诗风，表达了对时事的关切，风格也趋向于悲

壮激越。山人受其影响，当26岁以恩贡入北京应乡试时，所写的诗就体现了这一特点。明末，北方接连大旱，山人北行过沧州，写了《苦旱行》：

潞河数百里，家家悬柳枝。言自春及夏，雨泽未全施。
燥土既伤禾，短苗不掩陂。耨犂干以破，井涸园草萎……贫
者步垅头，怅然安所之？还视釜无烟，束腰相对饥。欲贷东
西邻，邻家先我悲，且勿计余年，胡以延此时？树未尽蒙
灾，争走餐其皮。门外兼催租，官府严呼追。大哭无可卖，
指此抱中儿，儿女况无多，卖尽将何为……

以白描手法，真实地写出了天灾与人祸的交相为害。其价值不减于白居易的《纳粟》和《重赋》。

这期间还写了另一类型的诗。山人入北京乡试，看到帝都的壮丽和附近的名胜古迹，写了一组歌颂和游历的诗。他写的《燕京颂》气势磅礴。如第一首：“昆仑全气结燕中，盘踞山河势不同。偶被溼温（元朝）坐帝座，还归华夏启神宫。长城远扈敦煌右，大海环收肃慎东。谁敢移京临塞下？文皇（永乐帝）千古一英雄。”如果与清兵占领北京后的《哀燕山》和明亡20年后写的《京师杂咏》对着读，可以看出清人初入京时统治者的暴政，使人有《黍离》之感。

31岁时（崇祯6年）二游江南，写了很多游历诗。江南多名城美景，按说山人应该留下一些写景的清词丽句才是。然而他却写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诗。如《游扬州梅花岭》，对这一处名胜却写出：“寒色众所弃，笙歌不复及。落叶积迳荒，雀粪满亭集”这样一片荒凉景象。他在杭州西湖住了一月，写的《别西湖》也有与一般只解歌颂西湖之美的人不同的评价：“闻见不异人，领略有得失。时为景所移，山水共厥秩……欣赏兼去取，亦兼虚与实”这里包含了一些哲理，使人想起王羲之《兰亭序》中“趣舍万殊，静躁不同……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”的名句。

1644年明亡及次年南京弘光小朝廷的覆灭，在山人心目中是大变故。这一时期的诗，几乎都是咏时事的，而且寄托了山人的忧国之情。南都初建，史可法督师，是南明存亡绝续之机。山人向史提出了进兵徐州的积极建议，可惜史不能用，反而退兵扬州。山人的失望，表现在一组五言绝句中：

两河诸父老，日夜乞王师。隔岁无消息，长征是几时？
东虏已南下，金陵方议和。出师将半载，犹未渡黄河。
河南驻大军，河北尽胡服。一水不能过，中原何处复？
我公径南归，已矣河北事。临行泣数行，不复能仰视。

不久清兵占领了扬州，发生了“扬州十日”的大屠杀。山人写了长诗《惜扬州》，一方面痛惜史可法退守扬州的失误，一方面表示“扬州之惨则深有可惜者”：

扬州今古称繁丽，本朝输转吭喉地。时当南渡守长江，阴雨更勤桑土计。议守长江先两淮，守淮先自河南议。河南江淮之上流，河南不守江淮弃。渡河径北是山东，江淮北藩于此寄。恢复中原岂易言，大抵两河均首事。史公督师入彭城，两河义士壶浆迎，人心如此即天意，命将西征或北征。缟素临戎直且壮，两河义士悉精兵，西收群塞图函谷，北联济邳指神京。左右有言使公惧，拔营退走扬州去。两河义士雄心灰，号泣攀辕公不驻……一朝旗纛广陵飞，笳鼓声悲箫管歇，鸣刀控尸铁锋残，僵尸百万街巷填。邗沟泉流京观槌，乱漂腥血腻红湍。掠尽巨商掠贵介，裘马郎君奔负戴，香奁美人膾卒配。妇男良贱苦鞭疮，疾驱枯骨投荒塞……

史可法是后人歌颂的民族英雄，山人却实事求是地写出了他的战略失误，不为尊者讳，是写诗而用史笔。

南都覆灭后，清朝在江北的统治巩固了。山人面对的一个问题，是不少人劝他出仕清朝。当时江南名士大多经不起诱惑，钱谦益、吴梅村、龚孝升、陈百史都北上了。这是一次严肃的考

验。钱、吴晚年都为变节出仕而悔恨不已，山人却经受住了考验。特别是他的好友陈百史几度劝他出山，他都毫不含糊地拒绝了。他有《答陈百史》、《再答百史》、《三答百史》6首诗，先是说“绝无世上弹冠想，徒有年来却聘书……侍郎休问田园事，先帝宫陵亦厖墟。”“谁无生死终难避，各有行藏两不如。”接着向陈百史明志：“已见沧洲沉义士，何妨洛邑怒顽民。”最后劝百史忘了他：“邴子无书酬北海，留侯何事苦东园。闲云过去相忘好，莫使空山有挂痕。”

他不止消极地不出仕，还积极地投入义军，从事反清活动。有关参加榆园军的诗，大约都被山人自己删去了。但是山人在义军中的地位重要，从清漕运总督逮捕山人，移交河道总督杨方兴，杨又以八县之兵押山人至三省总督马光輝处，马送交济南狱关押一事可以看出。山人对此事丝毫不畏惧，有二诗以轻蔑态度咏之：

千里严兵护，尚书畏孝廉。黄河弃东海，白日走西崦。
祸以知名取，行勿假数占。穷途还自喜，仗策入秋帘。

一蹇何劳八县兵？凌霜蹋碎济南城。方昏适值鼙头午，
近晓犹看贯索横。埋骨应怜无净土，招魂可惜是虚名。愁中
静思明夷数，箕子文王结伴行。

顺治10年端午，山人在狱中过了半年，态度仍然倔强不屈，有句云：“他乡无限河山泪，倔强尊前不忍挥。”“莫借长丝来续命，余生原不乞平安。”

从山东逃归家乡的次年，开始了逃亡生活。自顺治12年到康熙元年，九年间三经河南，两去山西，三过陕西，远至宁夏、甘肃、四川。由汉中沿汉水经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江苏诸省。所至有诗。有时藏匿友人家，后几年，居然住进上至布政使，下至知县的地方官员家。这些人大都知道山人的身份，山人在与他们互相酬和的诗中居然时时寄托对明朝的怀念，例子是很多的。如

“中华文物年来尽，里社优装独汉冠”。（《竖冈即事》）。“虚闻鬼卜鸣篝火，拟挽神弓射孟霜”（《过尹店》）。“诸生自说咸阳好，临到阮时始怨秦”（《冬夜杨犹龙托马茶史、孟陟公见招谈及南都秋闹事作此纪之》）。“霜露几经寒食火，园陵谁扫忌辰烟。朝来独望昌平拜，童子闻歌亦泫然”（《丙申三月十九日过闾乡有感》）。“云中羊犬尊呼岳，海内衣冠耻姓秦”（《元日过朱仙镇题岳忠武庙》）。“风雪一身在，江山何处归，习来饥渴惯，所至姓名非。”“煤山飞石弩，玉树咽金陵。”“一自焚阮后，谁能辨鲁鱼。”“家远不劳梦，年终将改春。伊谁相识者，此是旧顽民。”（《杨犹龙署中大雪刻烛征诗遂成三十首》）。“亡国大夫休语勇，入山名士且为僧。”“五世相韩心不死，十年存赵客无成……再世子真羞二姓，越山梅市即麻城”（《麻城哭梅惠连》）。“抛残故国人人旅，辜负春光日日深。”“地留东海谁曾蹈，家在西山不可臣。十载髡钳如一梦，九江风雨得三人”（《南康查天球周儒南昌彭躬庵冒雨至东林见访志之》）。其中“诸生自说”二句，把清初的南闾大案比作秦始皇的坑儒。“云中犬羊”二句，把清朝前身的金国人比作犬羊，讥笑他们称岳飞为岳爷爷；写得实在大胆。山人次子于山人死后托崔兔床尽快再删山人诗集有道理，这些诗放在雍正年间是会引出文字大狱来的。

康熙4年，龚孝升设法宽解了山人的罪名。次年，山人入京向孝升及票拟免罪的大学士魏裔介致谢时，也只是说：“萧然不挂一丝尘，泪洒东风谢主人，君相从来能造命，湖山此去好容身。”这次山人在北京，写有《京师杂咏》8首，诗中对清朝的“圈地”，记道“圈尽膏田乱结绳”。对降清的郑成功部下黄梧、施琅等人的受优待事记道：“投戈贼鬼争除目，减俸京官耐折腰。”对八旗兵抢掠汉族妇女写道：“京城内外市婆姨，雕鞞文裯彩帔帔……歌笑无端还痛哭，满头薪水愁分旗。”对把抢来的妇女分与沈阳的满族驻军写道：“都门何事最堪伤，络绎春围发沈

阳，空把蔡琴愁按拍，半怀徐镜耽临妆。”对清亲王大兴土木写道：“穷民恨咀天无眼，不见僵尸满路稠？”处处充满了对清政府的愤恨，并不因为清廷赦免了他而稍减。

但是这一年山人已经 64 岁了。有能力抗清的南明永历帝和郑成功都已死去，反清的事业处于低潮。山人和顾炎武、黄宗羲、屈大均等遗民一样，对撼动清廷基础，不再抱有希望，只能或著述、或组织秘密会社，为后人留下反清火种而已。其中，山人有志写成《边史》一书，以备后代守边者参考，特地有计划地再次游历北方的太行山和内外长城。自康熙 6 年至康熙 12 年间，山人的行迹限于河北（直隶）河南、山西三省间，有系统地考查了自北京沿太行山西麓南下直至河南林虑、太行之间和东到榆关、西到山西北部偏头、宁武、雁门三关和长城一线。这几年山人不再是各地逃亡，望门投止，而是为作学术考查，自愿地跋涉山川。以望七之年翻过太行山绝顶，又在隆冬之际经行于苦寒的晋北三关，这需要为学术而献身的绝大勇气。《边史》或部分写成而为先生焚毁，或因年迈而竟未动笔撰写，山人为此是付出了劳动的，证据就是这几年的诗作，每到一处，必有较多的诗篇，以记游为主，交友酬唱的诗减少了，述山势地形的诗增多了。这从下举的一些诗题中可以看出：《从林虑山南峪上天平山》、《从上党北行历滹沱亭驼背太行之脊》、《阙与城观马服君祠堂遂抵沔麻池登黄榆岭关》、《从发鸠山东游遍历沁州辽州和顺武乡皆太行胜迹》、《游晋祠登悬瓮山远眺》、《登姑射山望平阳诸山水》、《从天门关至静乐渡汾抵岢岚》、《河曲》、《从管涔抵偏头关》、《从偏头关东北抵老牛湾是黄河入中国处》、《游古代城望上谷云中诸山》、《风雪入雁门关》、《从朔州抵右卫望羊州东胜有感》各诗后面都有山人的长注，多是有关地理位置及发生于当地历史事件的。这些，有别于一般游山玩景的诗。写这些诗，无疑都是为写《边史》积累资料。